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论计划、平衡、速度、比例

(内部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
論計劃、平衡、速度、比例

中國科學院內蒙古分院經濟研究所編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我 国 党 和 国 家 領 导 人
論 計 劃 、 平 衡 、 速 度 、 比 例

內蒙古自治区經濟研究所編
(内部发行)

*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新城西落鳳街28号)

张家口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

开别: 787×1092毫米 1/32 ·2 印张

1961年3月第一版

1961年3月张家口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统一書号: 4089·3

定价: 一角三分

編 者 的 話

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過1958年和1959年連續大躍進，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既是高速度又是按比例地持續躍進的新階段。為了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我區各族人民和全國一樣，正在掀起一個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高潮。為了配合學習毛澤東經濟思想和幫助讀者正確理解國民經濟高速度和按比例發展的問題，我們選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關於計劃、平衡、速度、比例問題的一部分論述，分成兩冊出版。第一本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語錄；第二本是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論述。為了內容完整起見，第二本內也重複摘引了毛澤東同志的有關論述。這些語錄，只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我國部分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關論述的一部分。兩本均按內容分成“計劃”、“平衡”、“速度”、“比例”四個題目，每個題目下面的語錄，基本上按作者寫作或發表的先後順序排列，以便查閱。摘錄原則是尽可能采用最新最常用的版本。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時間倉促，摘錄和編排上的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尚望讀者指正。

編 著

1960年5月

目 录

計 劃

- 一、計劃的編制、执行、检查、調整 (1)
- 二、长期計劃与短期計劃 (4)
- 三、集体所有制經濟計劃 (5)
- 四、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綫 (6)

平 衡

速 度

- 一、高速度的发展 (12)
- 二、反对右傾 (18)

比 例

- 一、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意义 (21)
- 二、国民经济中几个重要比例关系 (23)
 - 1、两大部类的关系 (23)
 - 2、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24)
 - 3、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31)
 - 4、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36)
 - 5、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工资增长的关系 (40)
 - 6、商品供应与居民购买力的关系 (41)
 - 7、生产力的合理配置 (44)

附 录

- 打破旧的平衡 建立新的平衡 “人民日报”社論 (47)
- 力争高速度 “人民日报”社論 (52)
- 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謬論 “红旗”社論 (56)

計 划

一、計劃的編制、執行、檢查、調整

毛澤東：

……然而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學條件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況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地改變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覆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達到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使主觀的東西為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但是不管怎樣，到了這種時候，人們對於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個客觀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

……依社會運動來說，真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於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經說到的，而且在於當某一個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于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況的變化。

（“實踐論”，1937年。“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

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92—293頁)

……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現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計劃发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紅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文的按語，1956年。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1頁)

建立一个沒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經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現實。这个革命証明：沒有了地主和資產階級，人民完全能够有計劃地建設自由幸福的新生活。……

(“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論”，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年版，第3頁)

劉少奇：

……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業，這是我們党建社會主義的長遠方針，這也是擬定和執行第二个五年計劃所必須遵循的方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56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頁)

周恩来：

……各个企业、各个主管部門和国家的計劃統計机关必須系統地全面地研究生产和需要的情况，研究建設工作中各个环节的情况，进行反复的周密的平衡和計算，加强各有关部門相互的配合和协作，并充分地吸收广大职工群众的意見。只有这

样，才能正确地規定各種指标，訂出先进的確實的計劃。在执行計劃的过程中，还必須进行深入检查，及时地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問題，以保証国家計劃的全面的完成。

（“政府工作报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上，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8頁）

……我們應該对客觀情況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統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較均衡地向前发展。

（“关于发展国民經濟的第二个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56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頁）

薄一波：

大家知道，年度計劃的編制必須做到既能調動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有充分可靠的物力、財力的保証，并且保留必要的后备。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經濟計劃的安排，是尽可能地使基本建設的增长同生产資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使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同消費資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使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劳动工资的安排同国民經濟各部門的发展相适应；使国民經濟各部門在上下年度之間能够比較平衡地向前发展。在安排消費同积累的关系的时候，首先保証必要的消費；在安排生产同基本建設所需要的物资的时候，首先保証必要的生产上的需要；在安排基本建設的时候，尽量地注意到各部門投資比例的适当，并且發揮投資的經濟效果，力争使用同样数量的錢能够办更多的事。

（“关于1956年度國民經濟計劃的执行結果和1957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頁）

二、长期計劃与短期計劃

毛泽东：

这是一个十三年的长远計劃；可以作为各地的参考。这种計劃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們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这种計劃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还要用每一个五年計劃和每一年的年度計劃去加以具体化。由于几个年度計劃的实行，远景計劃会要一再加以修改的。

（“黄安地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远景规划”一文的接語，1956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1頁）

周恩来：

由于在編制长期計劃的时候，难以完全預計到在执行計劃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和問題，因此，應該把长期計劃的指标定得比較可靠，而由年度計劃加以調整。

.....

經驗證明，我們在編制长期計劃的时候，應該按照我們實現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財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規定各項指标，同时，還應該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計劃比較可靠。而在編制年度計劃的时候，就應該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發揮潛在力量，以保証长期計劃的完成和超額完成。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56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35頁）

三、集体所有制經濟計劃

毛泽东：

……在生产問題上，一方面，合作社經濟要服从国家統一經濟計劃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統一計劃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經營的經濟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計劃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計劃。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須處理适当，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們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頁）

刘少奇：

……应当按照本地方和国家的需要，在中央和地方的計劃指導之下，帮助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定适合于自己情况的发展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生产、畜牧业生产、副业生产的全面計劃；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報告”，1956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頁）

周恩来：

在农业战线上，广大农民已经在去年秋季和冬季，为今年的生产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为了实现今年的跃进計劃，还必须繼續动员群众，开展大面积丰产的群众运动。公社

的干部和县的干部必须深入田间，同社員打成一片，为今年夏季和秋季的大丰收而斗争，为实现今年一月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設先进单位代表會議所提出的十大倡議而斗争，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粮食、棉花、油料作物、麻类作物、糖料作物，各类副食品和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等项生产計劃而斗争。

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提供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的增产技术措施的丰富經驗。这些經驗使我們看到，适应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不同的作物，应当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应当千篇一律；各种措施又是互相关連互相依靠的，不能够滿足于仅仅采取某一种或某几种措施。我們必須很好地总结这些經驗，使各个公社、各个生产队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确定各种适当的增产技术措施，认真执行。

（“政府工作报告”，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上，1959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19頁）

四、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說，将群众的意見（分散的无系統的意見）集中起来（經過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見，使群众坚持下去，見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驗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馬克思主張的認識論。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年。“毛泽东

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921页）

同志們知道，我党規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綫和总政策，又規定了各項具体的工作路綫和各項具体的政策。但是，許多同志往往記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個別的工作路綫和政策，忘記了我党的总路綫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記了我党的总路綫和总政策，我們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們执行具体工作路綫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搖擺，就會貽誤我們的工作。

（“在晋綫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第1314页）

领导我們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础是馬克思列寧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開幕詞”，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頁）

我們应当相信群众，我們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頁）

……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內，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領導，党沒有向群众講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我們知道办社是好事情。但是办起社来，县委、区委、支部都不管我們了。恐怕是嫌我們寨子穷，吃不好，住不好，才不到我們社里來。”所謂混乱，沒有別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領導，当然就要混乱。領導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

（“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一文的按語，1956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67頁）

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

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季节包工”一文的按语，1956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59页）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红旗”1958年第1期，第3页）

周恩来：

……党始终注意使自己的领导同广大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引导群众不断地发展革命的自觉，组织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强加给群众或者把胜利恩赐给群众。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因为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就是坚持这种方法而取得胜利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新的事物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继续把这种方法有系统地运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从而形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而展开了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完全可以说，离开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

結合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也就不会有去年以来的国民經濟大跃进。

（“伟大的十年”，1959年。“紅旗”1959年第20期，第11頁）

這一波：

……一切經濟計劃經過群众的討論，經過群众的自覺的执行，許多原来被認為是先进的指标，也都变成了落后的指标，許多长期不能解决的問題，很快地解决了；許多过去認為要花很多錢才能办好的事情，用很少的錢就办好了；許多原來想不到的好办法，群众都想出来了；許多沒有发掘的潜在力量，不斷地被发掘出来了。……把增加产量、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項指标，交给群众去充分地認真地討論，把国家計劃同群众的自覺和实践結合起来，把国家制定的必須完成的計劃，同經過群众討論提出的努力爭取完成的增产計劃結合起来，超额完成国家計劃，就有充分可靠的保証。

在把計劃交给群众討論和組織群众执行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許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經濟工作人員特別是經濟領導人員的責任，就是要时刻注意发现先进的事物，认真总结和推广先进經驗，采取“抓先进和落后两头，带动中間”的方法，切实地帮助落后单位，赶上先进，使先进单位更加先进。

（“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汇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8—69頁）

平 衡

毛泽东：

……在客觀上將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时常經過国家計劃去調節。我国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积累和消費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对的統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說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統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統一成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时因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辯証規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3頁）。

刘少奇：

……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經濟按比例发展的客觀規律，在国民經濟各部門之間，需要保持一定時間、一定范围的平衡，而這正是社会主义國家的計劃工作的任务。問題是采取什么方法去平衡，是使落后赶上先进，还是让先进迁就落后。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1958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頁）

当然，我們必須做好国民經濟的計劃工作，尽可能使国民經濟的各个部門互相協調地向前发展。我們的要求是：又要高速度，又要综合平衡。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在高速发展中有較多可能出現某些不平衡現象。但是，我們不应当前怕狼，后怕虎，貪图安宁，用不适当的降低速度的办法來达到平衡。

只要我們注意總結經驗，認真研究客觀經濟規律，在高速度中求平衡是能够做到，也是应当做到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国的勝利”，1959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頁）

薄一波：

……今后在編制計劃時，必須對於我國現有的生產能力及其可能的增長程度進行認真的研究，同時要經過反復的平衡計算，以確定各部門發展的比例關係。在進行這一工作時，即需要依靠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沒有這一點，我們將寸步難行；又需要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使我們的計劃真正成為發揚積極因素，克服消極因素，經過平衡計算，能夠反映客觀實際的按比例發展的計劃，沒有這一點，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將不能充分發揮和鞏固，而國民經濟的某些環節還有遭受人為衝擊和失調的危險。

（“今年是國民經濟趨於全面高漲的一年”，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屆會議匯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8頁）

……所以，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如此螺旋式地反復，不斷前進，這是一種正常的現象。當不平衡現象出現的時候，有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一種是積極的方法，對新生事物感到高興，促進它的生長，依靠群眾的力量，及時地消除薄弱環節，使經濟的發展達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另一種是消極的方法，對新生事物熟視無睹，沒有熱情，對不平衡現象感到惶恐，不是努力把落後推向先進，而是企圖讓先進遷就落後。這兩種方法的區別，就是毛主席所說的促進派和促退派的區別。

（“關於1958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屆會議匯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9頁）

速 度

一、高速度的發展

毛泽东：

經過了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全国到处出現了蓬勃兴旺的气象。无论在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設事业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由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共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上論目前形势”，1958年。“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8期，第14頁）

刘少奇：

马克思預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們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

.....

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決議就已經指出：“中国的經濟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勞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的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經濟建設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計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經濟复兴的悲觀論點，沒有任何的根据。”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时候，党中央曾經批判了主张放慢建設速度的錯誤意見。第一个五年計劃規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党中央認為，这个計劃不但能够完成，而且可